

【文化杂谈】

□俞祖华

清季与民国,那是一个内忧外患、秩序动荡的混沌年代,“故国不堪回首”,又是一个大师辈出、名家云集的岁月。

人文领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神话与科技领域的西南联大奇迹,就是那个兵荒马乱的乱世给国人留下的“批量生产大师”的完美传奇,却难以复制。

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1日开学,名闻一时的“清华四大导师”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与李济等受聘执教,后因王国维自沉、梁启超病逝及其他原因,至1929年停办。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暂四年中培养了四届74名学生,包括梁实秋、徐中舒、姜亮夫、王力、吴其昌、姚名达、高亨、陆侃如、贺麟、蒋天枢等50多位世所公认的学术文化名流。

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,在“七七事变”发生、平津相继沦陷后,迁居西南边陲的昆明。战火纷飞中的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短短八年(1938年5月到1946年5月)里,共培养毕业生3343名,其中有杨振宁、李政道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有黄昆、刘东生、叶笃正、吴征镒4位国家科学技术

清季与民国为何大师辈出

最高奖获得者,有赵九章、郭永怀、陈芳允、屠守锷、杨嘉墀、王希季、朱光亚、邓稼先等8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173位两院院士。

在兵荒马乱、烽火连天的时代,何以大师辈出?在大师远去之后,人们希望拨开历史天空中的迷雾,寻求其中的奥秘。

还是要感谢时代的赐予,虽说那个时代充满着危机与绝望,但“绝望之为虚妄,正与希望相同”。西方文明的冲击,带来了全新文化元素;现代大潮的拍打,促进了全面社会转型。传统偶像与信仰打破了,势必需要价值重建;汉学、宋学被批判了,需要代之以现代学术体系;文言文被弃置一边,需要尝试新的话语表达方式。正是在价值重建、现代学术开创与采用白话文的过程中,成长起一批批学术大师,他们因为得风气之先而在社会文化的重新洗牌中成了时代的骄子。这就不难理解,提起“爱国”、“中华民族”、“经济学”这些现代名词,常是梁启超率先使用;胡适写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、《中国白话文学史》、《四十自述》等“半部书”,写了粗糙幼稚的白话诗集《尝试集》,居然能爆得大名。

以梁启超、严复、章太炎、王国维为代表的“清末一代”与胡适、鲁迅等“五四一代”知识精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:就西学视野与现代背景而言,前代的先贤大儒无法望其项背;从国学根底和旧学修养来看,后世学子又可望而不可即。这就容易理解“大师之后再无大师”了。

传统学术混而不分,而现代学术分科日趋细化。包括梁思成、梁思永在内的“民国一代”,适应治学日趋专门、学科日趋分化的趋势,成了刚刚开创的现代各专门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。如果说梁启超作为“清华四大导师”之一,其优势在于学贯中西、博通古今,因而能在开创“会通古今、会通中西、会通文理”的清华学派中发挥关键作用,那么,他作为父亲的卓越之处在于因其了解学术分科的趋势,故能引领子女在现代新学科的建立中占了先机。梁思成成为中国建筑史的宗师,完成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《中国建筑史》,在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,与其留美期间父亲专门寄来的一部重新出版的宋代书籍《营造法式》有很大关系。梁思永成为

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,可以说是对父亲事业的一种继承,也受益于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李济参加了田野考古实习。

清华国学研究院神话、西南联大奇迹与梁启超家教传奇,三大案例可说有一个共同之处,即“名师出高徒”。清华四大导师是毋庸置疑的顶尖国学大师。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时,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曹云祥向胡适征询,并拟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,胡适拒绝了,表示:非第一流学者,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,自己实在不敢当。西南联大的教师也是大师云集,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中,全部81位院士中,有27人出自西南联大,占了三分之一。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名教授给本科生授课的重要性。

再就是在民国学校教育中,教育行政化不算严重。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,实施了“教授治校”。清华园则流传着“教师是神仙,学生是老虎,职员是狗”、“校长是条狗”的说法。1928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,也盛传于当时的学界。大学不是衙门,教授个性飞扬,方能涵养大师的学识、精神与气象。

还有,民国学术名流有相对优厚的薪酬。民国前期,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,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职位的收入就是这个数。当时,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胡适、辜鸿铭、蒋梦麟等人的月薪为280银圆,胡适在1917年寄给母亲的信中提到“适之薪金已定每月260圆”,10月25日的信中又提到“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260圆,本月加至280圆,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”。梁启超于1925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,月收入是400元,此外,他还有多项兼职,收入也有稿费等其他渠道。

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抗日战争时期,梁思成、梁思永曾困于四川李庄,贫病交加;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也极艰苦,但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着大师的成长。正如杨振宁所说:“战时,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,然而,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,以极其严谨的态度治学,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。”出自陈寅恪之口的“独立之人格,自由之思想”,则是对那个时代大师级学人学术精神的最好提炼。

(本文为作者为鲁东大学教授,《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》一书作者)

【毛泽东诗词赏析之五】

《七律·答友人》

□吕家乡

九嶷山上白云飞,帝子乘风下翠微。斑竹一枝千滴泪,红霞万朵百重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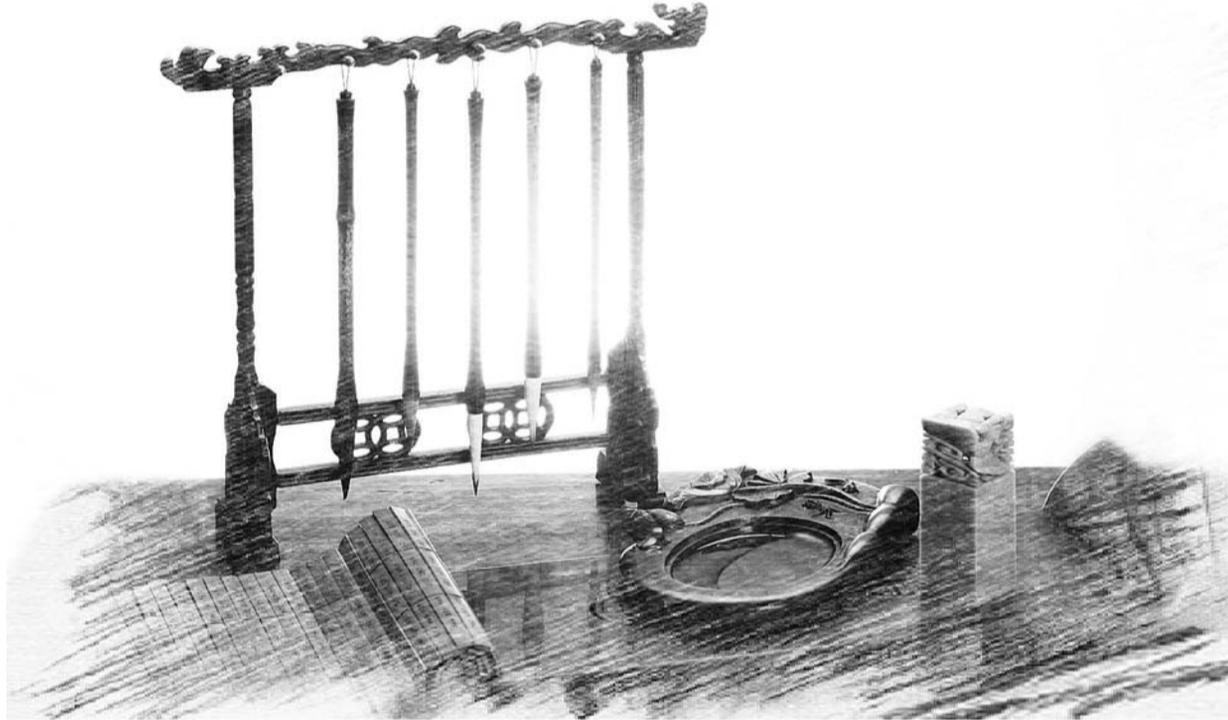
洞庭波涌连天雪,长岛人歌动地诗。我欲因之梦寥廓,芙蓉国里尽朝晖。

——毛泽东《七律·答友人》

1961年,国家正在困难的低谷,相对保持低调的毛泽东写出了他晚年最美的诗篇《七律·答友人》。本篇引入神话境界,写“帝子”(娥皇女英)从仙界回到人间,并非刻意而为,而是无意得之。显得真挚自然,借此把作者的潜意识也流露了出来。1975年,毛泽东对身边的同志谈到这首诗时说:诗里“斑竹一枝千滴泪,红霞万朵百重衣”,就是怀念杨开慧的,杨开慧就是霞姑娘!这话确实点出了这首诗的深层意蕴。

本篇写作缘起是,几位湖南的老友周世钊、李达、乐天宇等给毛泽东寄来富有家乡特色的土产、文物,还有各人吟咏家乡的诗歌,这些赠品和赠诗多和九嶷山有关。这不但让毛泽东感到友情的温暖,还触动他对故乡的怀念。九嶷山以及娥皇女英的神话传说自然地浮上他的心头,这又极容易勾起他对杨开慧的思念。于是,“帝子乘风下翠微”的意象里不由得融入了霞姑娘杨开慧的影子。“斑竹一枝千滴泪,红霞万朵百重衣”,正是“帝子”(娥皇女英)和霞姑娘合一的凄美意象,其中悲喜交融的感情既是帝子和霞姑娘的,也是诗人的。“帝子”和霞姑娘回乡自然会受到欢迎,“洞庭波涌连天雪,长岛人歌动地诗”就是欢迎的场面;表示欢迎的既有激动的自然山水,又有激动的乡亲。有人把这一联解释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画面,恐怕是误解。当时因形势严峻,毛泽东已宣布不吃肉,正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,不会在写给老友们的诗歌里粉饰形势。尾联说,“我欲因之梦寥廓,芙蓉国里尽朝晖”,以梦想展示对故乡(以及全国)美好的祝愿,是得体的、诚恳的,也许无意中流露了他对当前困难的了解和自己内心的愧疚之情。浓郁的友情、乡情和爱情融合在一起,通过审美想象幻化成一幅幅悲喜交集的画面,凝结成这一支感人肺腑又给人高度审美愉悦的交响曲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

【学界名家】

□钱汉东

钱谷融教授是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、中国文艺理论家,上海钱锺研究会名誉会长。不久前,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徐中玉先生百岁华诞庆典仪式上,我遇见了九十五岁高龄的钱先生。

钱先生精神矍铄,和蔼可亲。平时讲话不多,自谦是懒散之人,不用功,不像徐中玉先生那样生气蓬勃、有所作为。于是,在外人眼里,徐中玉先生属儒家,入世有为;钱谷融先生属道家,清静无为。其实,世人并不真正理解钱谷融先生,在我的眼里,徐、钱两位先生本质上是一致的,只是表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。

今年7月,赤日炎炎,我冒着酷暑去拜访钱谷融先生。在华东师大二村这座红砖老楼里,钱先生已居住了四十多年。客厅里的大吊扇呼呼作响,但转速再快也难以驱散滚滚热浪。坐在他的客厅里望向窗外,忽然有时间停滞的错觉。

一如往常,钱老还是那么谦虚,坚称自己没有什么成就,反而羡慕我在很多领域有所建树,还为钱氏家族做了不少实事。我听后立即冒昧地打断他的谦辞。我说,钱先生,你与徐先生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,都

真实的钱谷融

是以入世的态度工作和生活的,都是有志于社稷的,而你表现出来的散淡心态,完全是被社会逼出来的。

我的话声未落,钱先生的眼里已经闪出泪花,随即发出一声撼人心魄的长叹。他说:“汉东啊!整整三十八年呀,过着谁都可以辱骂的日子,在华东师大走路永远不敢抬头,我是一个贱民,是任人批斗的靶子,只能苟且偷生啊。”此时,我心头浮起“无能懒散”四个字,这是钱先生说起一生经历时最常用的四个字,应该是钱先生自我保护的秘密武器吧。诚如钱先生所言,他如果要抗争的话,大概早就离开了人世。

1957年,钱先生写的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震动文坛,为此,他吃了三十八年苦头。我问怎么会去写这篇文章的,他若有所思地说道:“那时毛泽东提出‘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’方针,提倡文学、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、辩论自由、创作和批评自由。华东师范大学乘势而上,我经不住学校的一再动员,一挥而就,写了那篇《论“文学是人学”》的文章。”高尔基有把“文学”当做“人学”的意思,这与钱先生心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拍

即合。钱先生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自己的观点——文学是人学,而不是什么“工具”。当时,“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”的文学观,是时代的主旋律,如果有谁提及“人”,就会被指责为“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”。但钱先生就是不肯趋同“文学即政治工具”说。

钱先生说他年少时喜欢诸葛亮,特别敬慕、钦羡的是高卧隆中时的草野隐士诸葛亮,而后来读到做了蜀汉丞相后写的《出师表》时,并未激动过。对《隆中对》一文,钱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,读了一遍又一遍。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,提出先取荆州为家,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,继而图取中原的战略构想,何等了得。钱先生从小就有报国志向,关怀黎民苍生。后来读到诸葛亮的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的名言,他心目中最初形成的诸葛亮的形象就越鲜明、高大起来。钱先生说他年少时和小朋友一起玩要,也常带着自豪的感情称自己是“山野散人”,立志苦读成才,报效家国。

1980年,在讲师这把椅子上端坐了长达三十八年的钱谷融,被直接提升为教授。当时有

人提议让他先评副教授,钱老说我宁愿不评。这也显示了他性格中刚毅的一面。其后,钱谷融的《〈雷雨〉人物谈》获上海市社科优秀著作奖;《艺术·人·真诚》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;1987年,钱老获颁华东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。

在钱谷融身上,我还看到了宽厚仁慈的美德。在钱先生落难时,他的一个学生居然向自己的老师“开炮”。当时人们在批判钱谷融时,还比较客气地称他为“钱先生”,而这个学生上台发言时居然直呼“钱谷融你听着”。这让钱先生大吃一惊。动乱结束后,这个学生参加职称评定,因她在“文革”中的种种表现,高评委中产生不同意见,但钱先生早就释怀了。他认为这个学生的家庭出身不大好,她只有表现得特别左,才能有立足之地。现在她的专业水平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评定。钱先生不计前嫌,独自在学生的职称评定表上签了名。以德报怨是钱谷融先生的为人之道。

钱谷融先生“行为世表,学任人师”,值得后世学人敬仰。(本文为作者为文汇报高级记者、知名作家)